电子信箱:sckb@vip.163.com 网址:www.dfsc.com.cn
编辑部:0595-88727096
广告发行征订热线:0595-88727095 13696908939

收藏快报

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

天一阁外雨窗前

——旷世珍本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发现始末

■四川成都 肖伊绯

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影印本,1929年"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"印行

马廉藏本影印《雨窗欹枕集》,1934年印行

著名藏书家、版本学家、戏曲小说史家马廉,生于宁波,自幼住在天一阁旁的马衙街。他自少年时代即喜读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,将藏书重点放在了小说戏曲一类的俗文学古本上,悄然步入当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研究领域。

1926年8月,马廉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。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,他一直致力于收集、整理、研究古典小说、戏曲、弹词、鼓词、宝卷、俚曲等古旧书籍与文献。他曾有三个书斋名号:"不登大雅堂""平妖堂""雨窗欹枕室",均与其藏书中重要的戏曲小说版本相关,由此亦可见其藏书与治学的俗文学特色。

"不登大雅"就意味着甘于坐学术冷板凳,乐于做荒山开路人。马廉后来的俗文学成就,可以说就是把"无米之炊"做成美食珍馐,把冷门学问做成了热门知识。

"平妖堂"的名号则直接来源于马廉的一部重要藏书,因其意外收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四卷二十回本《三遂平妖传》,喜不自胜,便自号"平妖堂主人",并将书斋改名"平妖堂"。后来,他又偶然购得天一阁散出的明嘉靖刻本《六十家小说》中的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,喜不自禁,更室名为"雨窗欹枕室"。直到马廉逝世后,周作人的挽联"月夜看灯才一梦;雨窗欹枕更何人",更点明了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这两部藏书对马氏的重要性。那么,马廉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藏书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有什么特别之处?

原来,两本集子还只是一部古代话本小说的残本。这部古本的另一半,藏于日本,命名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当时,马廉发现的这两本集子不但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,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日本藏本缀合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本子,对研究明代话本小说的演变有着极高学术价值。

经马廉考证,他发现的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与日本收藏的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合为一书的总名应为《六十家小说》。《六十家小说》原书为六十篇,据清代《汇刻书目初编》记载,分《雨窗》《长灯》《随航》《欹枕》《解闲》《醒梦》六集,每集十篇,共六十篇。

首先在日本发现的该书残本,中日两国学者起初都没有考证其原始出处,而是按照日本学者的命名称之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之所以这样命名,乃是因为这部含有明代嘉靖年间十五篇话本小说的古籍,由日本学者发现于内阁文库时,发现书板中心刻有"清平山堂"字样,于是将其径直命名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

实际上,这种命名方式是不正确的,"清平山堂"只是刻书者明代嘉靖间人洪子美的堂号,除此《六十家小说》之外,还刻有《唐诗纪事》《夷坚志》等。这种命名方式,好比"出版社+书籍种类"的方法,是相当笼统的,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。但因其书首现于日本,且日本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研究,"清平山堂话本"遂成为一个通用称谓,取代这部书在中国原有书名。

1928年春,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来华,向马廉出示了该书的照片。马廉随即与友人发起"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",托北平京华印书局于1929年将这含有十五篇话本的明代古籍残本影印出版,仍旧题名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与此同时,经周作人等相助,马廉还翻译了长泽规矩也的论文《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》,连载于孔德学校《AC月刊》1930年第1—3期。在该文"译后记"中,马廉对清平山堂主人——洪子美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刊书籍,做了初步考证。据其所见古本的细节特征,马廉在为影印本所撰序文《清平山堂话本序目》中大胆预测:"此本原书若干,今不可考,盖洪氏当时,搜罗所及,便为梓行,别类定卷,初未之计也。度绎体例,类似丛刻,故多收话本而亦复杂文言小说。"

显然,马廉对此书的残本性质以及真实名称都有了初步结论,只是苦于国内并未有此书的任何发现,这些结论还只能停留于假设。为证实自己的假设,此后数年之中,马廉留心寻访、苦心搜求。

1933年秋,刚向修缮一新的天一阁捐献晋代古砖欲返回北平的马廉,在旧书肆偶然购得一包残书。在这包残本故纸之中,意外发现十二篇话本小说,其刻本版式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"清平山堂话本"完全一致,且篇目竟无一重复。据书根题字"雨窗集""欹枕集"笔迹,马廉考定其为天一阁旧藏。数年夙愿,得偿一旦,这令素来谦和低调的马廉,难抑兴奋之情,他为之得意地声称,此次发现"真是小说史上一段佳话,而为我平生的一桩快事。"

经考证,这十二篇话本小说,与后世改编的多种话本小说均有关联,诸如著名的冯梦龙、凌蒙初"三言二拍"系列、《金瓶梅词话》《古今小说》《续金瓶梅》等。换句话说,马廉的此次意外之获,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者们又找到年代更久远、更接近于原本的原始文献。这一发现,无异于一次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里的"哥伦布式发现"。

1934年8月,马廉将新发现的十二篇话本小说整理影印出版,命名为《雨窗欹枕集》;并撰写了《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》。除了简介发现经过及与日本版本的比较研究之外,结合自身藏书及所见闻者,马廉首次将十五篇"清平山堂话本"与十二篇《雨窗欹枕集》合并一体,与《警世通言》《喻世明言》《醒世恒言》《古今小说》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《熊龙峰刊四种小说》进行比较研究。这份研究成果,不但是对"三言二拍"系列研究的可贵贡献,而且在至今未能发现更多新文献的情况下,始终代表着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高度。当然,在意外之获与研究突破的欣喜之中,那个时代的俗文学研究者如马廉这样幸运者并不多见,在这一领域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,还始终依赖于更多更新的古本被发现与发掘出来。大多数研究者只能被动地等待新材料的出现,进而不断地更改自己现有的学术观点与结论,这个过程周而复始,既漫长又无奈。

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背景与时代境遇之下,马廉总算为中国俗文学研究者们带来了一份"惊喜",让在这一领域本已领先的日本学者多少有了一些懊丧,也让懊丧着去日本访书的中国学者们多了些许自信与坚定。

古籍的文物收藏价值如何衡量

■河南 牧野

衡量一部古籍的文物收藏价值,要从年代、稀缺程度、工艺水平、传承情况等方面综合考量。

先说年代。唐代以前的古籍,主要是以手工抄写的形式传世,到晚唐时期,发明了雕版印刷术,书籍才得以快速普及,由于纸张难以保存,又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,到现在,唐代的写经已经很少,宋代的雕版印刷书籍稀若星凤。早在清末民国时期,就有一页宋版书一两黄金的说法,现在市场上的宋版书,每页价格也在几万元。一部保存完好的宋版书出现在拍卖场上,必定引来众多收藏家的疯狂抢拍,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

2012年拍卖的宋版《锦绣万花谷》,原系江南名门望族顾氏私家藏书,2005年这部分藏书曾以2310万元的价格在中国嘉德拍出,一度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最高价。七年之后,这批古籍再次露面,拍卖价格达到2亿多元,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最高价。

古籍的稀缺程度。物以稀为贵,稀缺的东西总是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,一部古籍,如果存世量寥寥无几,价值肯定很高,如果是仅此一册的孤本,更能激发收藏家的占有欲望。古籍市场上,哪些存世量较大的字典类、作为旧时学生课本类的四书五经,价格都比较低,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稀缺程度对判断古籍价值的重要性。

2000年春季的嘉德春拍,有一册明末李自成大顺政权的《大顺律》,这册书仅有8页,在此之前,研究界和收藏界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。正是由于有了这8页古籍,才证明了李自成的政权曾经颁布过这样一部法律,最后这部书的成交价达到3.85万元。

古籍的工艺艺术水平。古籍通常采用雕版印刷,如果是活字印刷,价值就明显提高不少。我国的活字印刷术,虽然在宋代就有记载,但现在能够看到的实物,最早的才到明代。古籍雕版多由工匠完成,但如果是历史上的名人手书上版,能够显示高超的书法艺术水平,这样的古籍价值自然也高。明末以来,版画盛行,再加上多色套印,书籍的艺术性更高,所以,古籍上具有多幅版画,又采用套印技术的,比一般的古籍价值也就高出许多。

明活字本古籍存量稀少,其著名者屈指可数,民国年间几乎已经被大藏书家垄断。明万历二年周堂铜活字印本宋李

《锦绣万花谷》

棠编《太平御览》,共140册,成交价达到715万元,超出估价的三倍。清初刻版八色套印本《绘像三国志》,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郑振铎捐赠的残本,此外不见任何著录。2002年,嘉德拍卖拍出的《绘像三国志》,以人民币50.6万元成交。

古籍的传承情况,也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方面。历代大家收藏过的古籍,本身就比较珍贵,再经过藏书大家或者王公贵族收藏,更为古籍增加故事色彩。所以历经名家递藏、传承有序、收藏鉴赏印痕累累的古籍,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。

《心经》是佛教典籍中字数最少、篇幅最短的经籍,1995年上拍一件唐人写心经,上有许莼父、孙尧、张伯驹收藏印章,并有张伯驹题记:此唐人写经残本,仍可宝也。有张伯驹题记,这件古籍的真实性和历史文物价值得到彰显,最后以6.8万元成交。